

●主持人语



徐海

本期邀请一南一北两位出版家为“编辑故事”撰文，他们分别是刚刚卸任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李岩，以及广西出版集团的副总经理、总编辑卢培钊。

约李总的稿件很难，至少约了3次，大约3个多月，因为他现在还是全国政协委员，事务冗多。我和李总曾在若干次会议上相识，但并不是深交，直到现在仍不能说很熟悉。从陌生人到相识，从相

识到熟人，从熟人到朋友，从朋友到知己，都有很长的路要走，可是我和他单独相处的机会十分稀少，求教更少。2008年8月，我陪我们集团前前任董事长梁勇到中华书局学习他们古籍数字化的经验。徐俊把李总一起请来，算是一次久谈。

后来国际儒联出版委员会成立，我忝列成员，而主任就是李岩，我是他的部下。在这个机构里，我们一次相聚在大

百科出版社，一次短暂地相聚在南京四方城。还有最近，就是今年的上海书展，全国古联体出版界同仁相聚，阚宁辉把我和凤凰传媒副总经理袁楠也拉去。我与李总比邻而坐，对饮畅谈甚欢。

培钊兄原是广西人民出版社的社长，后任广西科技社社长，如今与我有相似的岗位，自然与我有不少共同语言。从来稿看，他还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干过。这么丰富的履历，我自叹不如。培

钊兄不但出版能力强，书法也是一流。我曾看到他用行草书写的《与朱元思书》，那是我最喜欢的一篇清丽秀寒的散文，还有他所书郦道元的《三峡》同为我所钟爱，便不知趣地向他讨要，培钊兄果然弃爱送我，我视为珍宝。

李总和培钊这两篇文章分别叙述了中华书局编辑的优良传统以及培钊眼中优秀编辑的模样，足资天下出版人效仿。

中华书局编辑与作者交往的秘笈

□李岩

从古至今，人类知识与智力成果的传承与传播，都是依托出版这个媒介来完成的，这也是出版的初心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同孔子是早期中国的杰出编辑家和史学家，正是他开启了对先秦思想文化与文献的辑录、编纂与集成，并成功地将先民的思想理念，借助历代王朝统治者的推动，铸造成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而古代文献典籍聚散流变的核心轴便是对儒家经典乃至先秦以来的文献加以诠释解读并赋予新的使命（冯友兰先生所称“旧邦新命”）。

个人有幸在1987年研究生毕业后入职中华书局，成为以传统文化读本为品牌出版标志，以传统古籍出版重镇为出版使命的著名出版机构中的一员。中华书局的编辑养成史素有传统，加入学会，深度交往，提升视野，审读稿件，组织学术传播与知识生产，成为学术界中坚力量和顶梁柱。我所服务的中华书局和我所熟知的赵守俨、傅璇琮、程毅中、周振甫、李侃等先生，即是这一传统的代表。

中华书局有一个好的传统，要求入职后的年轻编辑们一定要加入各个学会，加强与学术界的深度交往。我因为学隋唐历史文献学，所以很快就在先生们的推介下加入了中国唐史学会、中国宋史研究会和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并与这几个学会的几位会长、先生们都有深度的交往。

第一位要提到的是漆侠先生。记得是1992年下半年，我刚到总编室担任负责人，就受傅璇琮先生的委派，参加在保定河北大学由中国宋史研究会举办的国际宋史学术研讨会。在这次的研讨会上，有幸结识了包括漆侠先生、张曦、王曾瑜、裴汝诚先生等一大批知名的宋史研究学者。特别是漆侠先生，他把我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上。他说，小李，你不是代表你个人，你是代表中华书局，代表中华书局的总编辑傅璇琮先生来参会的。临行的时候，专门把我叫到身边，嘱咐我一定要向傅璇琮先生问好，表达学术界对中华书局的向往，以及期待在中华书局出版学术论文集的愿望。后来这次国际宋史学术研讨会学术上相关著作的重要论著由中华书局另一位资深编辑汪圣铎负责出版，保持了书局和学者的交往热度。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也是我加入的重要学术团体。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在厦门同安举办了一次年会，当时张舜徽先生和北师大的刘乃和先生都参加了。会上，张舜徽先生详细询问我的学业师承，他们两位先生和我的导师吴枫先生都很熟。我记得刘乃和先生还说了一句话，“哎呀，吴枫先生很厉害啊，他把自己的两个弟子都推荐进中华书局。”我和我的师兄王景桐当时都供职于中华书局。张舜徽先生当时就问我：“你不想继续深造，读我的博士生？”后来由于机缘未至，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但是后来我和他的很多位博士生如周国林、傅道彬、王国华、陈虎等诸位先生都成为学术界的好朋友。

对于宋史学界另外一位巨擘邓广铭先生，我们更是心驰神往。他的很多学生都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所以我和邓先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我记得当时探讨邓广铭先生几部大传出版的事情，当时三联书店的总编辑李昕专门给我打电话，说希望中华书局退出竞争，由三联书店出版，并且一定会出好。我就此专门和邓小南先生打过电话。邓小南说，这两家出版社和他们关系非常好，她难以割舍，所以我们来决定，只要把书出好就可以了。这是一段学界交往的佳话，也是我们保持和这几位学术界大师深度交往的佐证。

中华书局的这一传统，是前辈先生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像赵守俨先生在主持“二十四史”的编辑出版工作中，与祁龙威、唐长孺、王仲荦、陈仲安、王钟翰、启功等诸位先生的友情，我们都曾口耳相传或是听前辈们反复提及。再如程毅中先生和古典小说界、古典文学界的前辈学者们翰墨酬和与交往。特别是傅璇琮先生，他和老一代学者程千帆、漆侠、蔡义江、倪其心、褚斌杰、金开诚、沈玉成、罗宗强、曹道衡、周助初等先生涵泳蕴藉，相互推重，在唐宋文史界与同辈学者大家们共同推动唐宋文史研究向纵深挺进。此外，特别是他奖掖扶助中青年学者的廓大情怀让人难忘。他对晚辈后学的提携奖助，对晚辈的求助从不拒绝，这一点我觉得弥足珍贵，也时时从旁印证着。这种学术界与出版界的深度交往，共同推动文史学界呈现勃勃生机、学术新意盎然。

除了通过参加学会结识大家名家作者外，保持与名作者在工作乃至生活上长期不断的深

人联系，也是中华书局维护作者资源的重要优秀传统。

还可以举著名学者、“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的例子。那时候我们和冯先生关系相处得非常好，每年的春节前几天是冯先生的生日，我们一定要在春节提前几天到他家去拜访。我记得当时是中华书局的资深编审柴剑虹、朱振华两位经常陪同我们，后来还有徐俊、顾青一道到冯先生家去拜访。冯先生特别高兴。有一度他要出版全集，当时也面临着多家出版社竞争，我们也多次表达了出版的意愿。后来，青岛出版社抢在了前面，他们提的很多条件及服务细节，让冯先生很满意。我和傅璇琮先生参与了冯先生全集的编辑出版过程，我们也作为编委会的成员，承担其中的部分工作，帮助把这套书出版得精美典雅，全集也获了大奖。冯先生一直很感激我们这种无私的友情，并在日常的交往中屡屡提到。

我看首届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李国文先生的作品较早，在学期间，认识他本人则是遵汪晓风署长之嘱，在1997年底，先生转型散文随笔写作之后，为他购买打听的“二十四史”。其后《通鉴》《通典》等史书，以及大量史料笔记都是我主动送上门的，从此成为家中常客，每年三五次探望聊天都是心仪神往。李先生说唐，说宋和重新评点《三国演义》都是我主动为中华书局邀约的稿子。李先生经常讲一生中始终伴读两种书：《红楼梦》和鲁迅杂文集，对我辈也深有影响，甚至是终生受益。在我人生中面临几次重大选择的时候，我都要打好电话到李先生家中长谈，一杯手冲咖啡，一杯清茶，每次都是如沐春风，教益良多。在李国文先生的追思会上，我发言时数次哽咽，情怀难禁。

还有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与中央文史馆馆长袁行霈先生的交往。袁先生和中华书局的情谊更加深厚，他和程毅中先生是前后的同学，经常听他提及程先生和傅先生，这两位先生都是他的学术诤友。袁先生在写作《陶渊明传》的时候，在研究文学通史的时候，他的许多文史图书及国学研究杂志的出版，都请中华书局的资深编辑参与其中。他主持海外汉学家研修活动，主持中央文史馆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和《传统文化百篇赏析》两部皇皇巨著，中华书局也都参与其中。

这两部巨著，都是由袁先生主编的。他把编辑出版的工作交给了中华书局，表现了对我们充分的信任。当然，袁先生生前我也都要去探望或者电话问讯，表达我们的诚敬。有一次我到袁先生家里，袁先生和我、徐俊还专门合影留念。袁先生的夫人杨老师主动说，李岩，行霈说你来，他特别高兴，在你来之前专门给你写了幅字。袁先生的这幅墨宝，我一直珍藏着。袁先生轻易不赠人墨宝，但是他对我们这些晚辈特别厚爱、关切与慷慨，让我们感佩、铭记于心。

还有两位先生，也特别值得一提。一位是大艺术家韩美林先生。我们是韩先生在北京的艺术馆的常客，他在宁夏、江西、浙江开分馆的时候，我们都有幸参与其中。韩美林先生和他的夫人周建萍女士同我们都是李岩，韩老师每年的书画展我一定要参加。他的著作《天书》也是我力促由中华书局重新再版的。韩先生的传记，包括周建萍女士记述他们生活的一些图书，也都由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另一家出版机构华文出版社来出版。这也印证了韩美林先生和周建萍女士与我们持续十余年的深厚情谊。

我们也时常到韩先生家里去探望，享受韩家宴的美味，感受艺术家的人格魅力。每次到

展，我们也专门陪同参加。包括在外地的大篷车活动等，只要我们有时间，一定会陪同他们去。这些体现了一位艺术家对我们晚辈、对于出版人的深情厚谊。韩先生很关注自己作品的印制出版，对中华书局很多编辑同仁和雅昌文化的万捷、何曼玲都充满了无限关怀与深情厚谊。

最后讲到一位先生，阎崇年先生。阎先生多年深耕清史领域，特别是清朝入关前后清初的历史，是该领域国内外顶尖的学者。他和中华书局的老一代，特别是李侃先生保持了密切的学术交往。他经常给我讲这一往事，当时中华书局正在出版吴晗先生整理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尚未出版只是清样的时候，李侃先生就允许阎先生到中华书局查看有关的清样，誊抄这部分史料。

《正说清朝十二帝》（原名《清宫十二朝疑案》）是由当时中华书局的一个年轻编辑，现在的优秀出版人三联书店总经理宋志军发现的。宋志军发现这部书稿后，当时就报告了我。我当时和中华书局的另外几位同事顾青、沈致金、宋志军，由我开车直接到阎先生家里争取这部稿子。当时已经有30多家出版社在竞争，但是我们的诚意深深打动了阎先生，阎先生和夫人解老师决定把稿子交给我们。书名是我们经过请示杨牧之署长之后，确定下来的。《正说清朝十二帝》成为一部改变历史类图书阅读习惯、引领学术风尚的新书，引导了一系列“正说”系列。中华书局及更多出版社出版的“正说”系列，整个销售应该在千万册以上。中华书局这本《正说清朝十二帝》也成为经典之作。阎先生在今年中华书局出版《正说清朝十二帝》（二十周年纪念版）的序里讲了这段故事，讲了这本书名和作者与学者、出版人之间的交往佳话。阎先生一直保持着跟我们的深度交往，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华文出版社也出版了阎先生的著作集。他的大部分著作都由中国出版集团旗下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和学者之间深厚友谊的见证。

我举早年间在中华书局供职时这些出版界和学界交往的例子，是想说明优秀的出版物，它的创作与生发来源于作者，来源于作者和出版人之间深度交往过程中的发现。我认为，一个时代的成长进步，一个时代的递进发展，离不开作者，包括艺术家、科学家、作家们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服务和人类智慧的结晶，离不开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出版人，离不开优秀作者增进人类福祉的智力成果的汇集。我们作为人类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专业化社会组织机构中的一员，特别是优秀的出版人要去发现这些成果，并把它们传播传承出去，以最好的载体形式呈现给读者、民众，这就是出版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是我们需要恪守的永恒不变的职责。

从业三十七八年，常感慨编辑生涯最值得骄傲的事是有一两本好书流传下来，成为架上度藏之物，并时时引以为荣。机遇从来都是提供给有准备的人，准备接受上天礼物的人整日里虔敬勤恭克俭地工作，与人广泛交往期盼着有好书的降临。那些心有千壑、胸中万卷的作者何尝不是日夜逡巡地观望者考察着，反复斟酌探讨才把那绣球抛出来，交给他们认可合适的出版社和合格的编辑出版人。我们常常艳羡那些出得好书的优秀出版社、出版人和知名的图书品牌，其实包括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知识传播者在内的优秀作者，才是并且永远是优秀出版社优秀图书的源头活水和亿万读者朋友的福音。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

图书行业要持续发展，编辑职业要得到读者的认可和社会的尊重，从业者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素质。

首先是爱书。

这些年，在招聘编辑面试环节，我一般会问两个问题：最近读了什么书？最近去过哪家书店？我试图通过他们的回答，感受到应聘者对于书籍的一份热爱。一个对书籍没有感情的人，不可能做出好书；一个对出版行业价值没有正确认识的人，当面对其他职业的诱惑时，往往不能坚持太久。

对于新人入职出版行业的编辑，我推荐他们去读已故出版家刘硕良先生的《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春潮漫卷书香永——开放声中书人书事书信选》。这位参与创办漓江出版社并主持“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出版，从而影响了一个时代阅读的老一辈出版家，一生都对出版事业保持着赤子之心，是后辈出版人的楷模。

今年开春，我策划组织了“与出版前辈谈做书”的系列沙龙，每月一次，邀请集团旗下各出版社的老同志和年轻编辑谈出版，谈情怀。我始终认为，从事出版行业最为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对书籍、对阅读、对出版价值的基本观念和朴素情感。如果没有这种情感或者情怀的支撑，对这个行业就不会有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遑论出好书。只有在情感上对承载着传承文明的出版行业和书籍载体，发自内心的热爱，才有做出好书的动力。

其次是识稿。

一部书稿的去留取舍，取决于出版者的判断。如果编辑缺乏眼光，决策者不能果断，很容易错失好选题。

二十年前，一部名为《伤寒杂病论》的书稿，送到某出版社而被拒绝，书稿转到广西师大出版社，经过知名编辑龙子仲的精心编辑，这本普通的学术专著被打造成为现象级的畅销作品《思考中医》。彼时，我正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多年后，我被调到了这家曾拒绝了这部书稿的出版社任职，每次想起《思考中医》就不胜唏嘘。我常常以此案例与同事共勉，要修炼“识货”的慧眼和“雕龙”的本事，不能重蹈覆辙。

2015年夏天，党史研究专家陈晋先生的书稿《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原计划在外省某出版社出版，因为这家出版社人事变动导致项目搁浅，书稿辗转到了广西人民出版社。当时，我在该社任社长。由于项目初步匡算投入近200万元，社里不少同志有顾虑，担心出版社财力有限，投入过大难有回报。但我认为这部书稿作者权威，内容扎实，坚持主张积极对接推进。在推进过程中，又有同志提出，这个选题20年前某出版社已经出版过，担心作品的原创性不足。实际上，这部书稿内容已经大幅扩展，原创性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些不同的声音，使得决策难以形成一致的意见。在最后的讨论会上我说，如果这样有分量的选题人民社都抓不住、留不下，还谈什么出精品，做好书。大家最终统一思想，下定决心做好这个选题。

这部书稿还在编辑加工中的时候，我接到调任广西科技社社长的通知。不少人担心人事的变动会导致项目再次搁浅，令人欣慰的是，人民社新班子一如既往地重视并推进，这个项目得以高质量完成出版。图书出版面世后，受到各方的高度评价，先后荣获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两项大奖，并且多次重印，真正实现了“双效”俱佳。

后来，邻省出版集团领导带队来广西交流，在座谈会上提到当年错过的这个选题，扼腕不已。

再次是耐心。

一本好书是作者、译者、编辑、设计师齐心协力打造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足够的定力，要耐得住寂寞，受得住煎熬，如果心浮气躁或急功近利，不可能打造出的好书。从2013年开始，我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培育“大雅”子品牌，首推“大雅诗从”系列，翻译引进世界诗歌经典。“大雅”团队对品质精益求精，因此推出的作品都要经过反复打磨。如《白鹭》这部诗集，篇幅并不大，但译者躬身说翻译的过程“像从地獄里走了一回”。又如《奥麦罗斯》这部史诗的翻译，凭借此书获鲁迅文学奖翻译奖的译者杨铁军先后五次修订译稿，反复调整句式，力求贴近原著，以致“翻伤了”。有的诗歌英文原作复句叠加、缠绕，编辑的核校过程就

编辑的四个素质

□卢培钊



极为辛苦，往往要经历“孤灯苦对五更书”的寂寞，耗费无数时日才得以完成。正是这种对内容品质的极致追求，使得“大雅”经过10年锻造，成为了中国诗歌出版重镇。“大雅”品牌刚刚起步，我就调离了人民社，但我在各种场合都不遗余力为之鼓劲、点赞，不是因为我曾经参与而对格外关爱，而是因为“大雅”始终坚守做好书的标准，耐得住寂寞，保持定力，持之以恒。

我调任广西科技社后，从社科人文转向自然科学出版。科技社的不少书稿，因为涉及大量野外考察、研究、拍摄，从策划到出书，往往需要更为漫长的时间，同样考验着作者与编辑的耐力与定力。如《秘境守望——东黑冠长臂猿寻踪》一书，摄影师黄嵩和二十余次进入广西邦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喀斯特雨林无人区，追踪拍摄极为珍稀的东黑冠长臂猿种群。密林深处孤独艰苦，环境险恶，而长臂猿的行踪极难捕捉。“有时蹲守一个星期，都按不下一次快门”，在和嵩和见面时，他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我当场与他约稿，并提出预付稿酬作为后期拍摄经费。在之后的拍摄、撰稿过程中，我交代编辑不要催稿，只需耐心等待。书稿完成后，编辑过程也极为缓慢而费时。为了实现更好的出版效果，编辑和嵩和也常常有分歧和争执，仅是封面就讨论了近百稿。最终，这部作品历时近三年才完成出版，在全国科普作品评选中斩获银奖。

《广西植物志》编研出版时间更长，甚至跨越几代人。这个项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历经36年，140多位研究人员参与，五代研究人员接力，这套6卷本、一千多万字、数千幅手绘图画的浩大出版工程才得以完成。我到科技社工作时，正值最后一卷付梓。我常把这套巨制称为广西科技社的“镇社之宝”，因为它不仅凝结了几代科技工作者默默耕耘的心血，更是出版界奉行长期主义的优秀范本。

最后是深交作者。

1996年前后，北京大学的潘文石教授来到广西，扎根崇左深山密林中，从事白头叶猴的保护与研究，一干就是近30年。这样一位扎根广西的重量级科学家，之前出版社居然和他没有太多交集，不得不说是—种缺憾和疏漏。

到科技社工作后，我便安排联系前往崇左北大白头叶猴研究基地拜访潘老。潘老已有八十高龄，头戴一顶旧的棒球帽，他热情地和我们畅谈研究成果和出版计划。之后，出版社和潘老的走动就频繁起来，每逢重要节假日，我们都到基地看望潘老。每次我们到来，潘老都高兴地安排助手下厨烧上家常土菜，大家围坐一桌，其乐融融。书稿完成后，他带着团队回访出版社，谈到兴起，午餐就叫外卖在会议室解决。潘老经常到访社里，社里年轻编辑和潘爷爷都很熟络了，围过来嘘寒问暖，合影留念，一片欢声笑语。为了方便潘老工作，我们在社里开辟出一间办公室，成立“潘文石工作室”。在我们的眼中，潘老不仅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作者，更是和出版社融为一体、亲如家人的一位长辈。

潘老带领团队完成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献礼工程“我们的广西”丛书《白头叶猴》《中华白海豚》两本极具分量的书稿。之后，潘老又带团队投入《弄官山——在白头叶猴中间》的创作中，这部记录潘老三十年的野外科考的重量级作品，成功入选国家出版基金扶持项目，付梓在即。潘老不止一次说，他的所有作品都会放在科技社出版，这是对出版社莫大的鼓舞。

（作者系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总编辑）